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朱汉民 邓洪波 主编

中国书院通史

明代卷

邓洪波 肖 啸
兰 军 张劲松
宗 尧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朱汉民 邓洪波 主编

中国书院通史

明代卷

邓洪波 肖 啸
兰 军 张劲松
宗 尧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 长沙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书院通史. 明代卷/朱汉民, 邓洪波主编; 邓洪波等著.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23. 12

ISBN 978-7-5667-3296-5

I. ①中… II. ①朱… ②邓… III. ①书院—教育史—中国—明代
IV. ①G649. 299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 (2023) 第 237259 号

中国书院通史 明代卷

ZHONGGUO SHUYUAN TONGSHI MINGDAI JUAN

著 者: 邓洪波 肖 啸 兰 军 张劲松 宗 尧

责任编辑: 王桂贞 崔 桐 李 婷

印 装: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1000 mm 1/16 印 张: 29 字 数: 428 千字

版 次: 202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7-3296-5

定 价: 116.00 元

出 版 人: 李文邦

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 410082

电 话: 0731-88822559 (营销部), 88649149 (编辑室), 88821006 (出版部)

传 真: 0731-88822264 (总编室)

网 址: <http://press.hnu.edu.cn>

电子邮箱: 934868581@qq.com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凡有印装差错, 请与营销部联系

总序

朱汉民

一千多年的中国书院史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历史中，显得不够漫长。但是，中国书院定型于中华文化发展的两宋时期，故而可以将其理解为中华文化登峰造极时期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所以宋代书院制度一确立，就能够绵延不绝并不断发展，表现出文化深厚、优势突出、成效显著等一系列特征，成为中华民族古典教育、文明形态的典范。而且，中国书院制度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亚、东南亚国家，成为东亚、东南亚儒教文明的重要文化标识，最终成为人类多元化高等教育或精英教育的独特模式与杰出代表。

《中国书院通史》是第一套多卷本的有关中国书院通史的大型学术著作。我们希望全面、深入、系统地考察这一代表中国文化精神、浓缩中国教育理念的书院文化的历史，并将其纳入中华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展示中国书院从萌芽、定型到衍化的漫长历史，为学术界、教育界的专业人士和文史爱好者提供一套关于中国书院通史的学术著作。一套中国书院通史类著作，既需要全面展示书院作为中国传统教育形态的衍化历程，也需要通过书院文化的特殊视角探讨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本套书之所以用四卷本一百多万字的篇幅来撰写中国书院的发展历史，首先当然是因为中国书院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种独特形态，它的产生和发展能够充分展示中华教育文化的创新意义与独特贡献。所以本套书通过全面、细致地考察不同历史阶段的书院教育，以向读者完整地展示这一独特教育制度、文化形态的衍化历程。与此同时，由于本套书特别关注中国书院在中华文化体系

中的重要地位及其特殊形态，故希望在考察中国书院教育历史的同时，能够进一步深入书院文化蕴含的中华文化精神内核，由此进一步思考、探讨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中国书院制度与中国传统政教文明、中国书院精神与士大夫精神传统、中国书院教育传统与中国学术传统的互动关系等等。我们认为，通过对中国书院历史的深度考察，进而能够了解中国教育史、中国学术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政治史和中国文化史的发展。从一个重要视角了解中华文化史的发展，这应该是我们撰写中国书院通史的学术目标。

所以，凭借撰写总序的机会，我们试图首先对与书院史相关的重要问题以及本套书的特别学术关注作一说明。我们希望读者在了解中国书院的漫长衍化历史之前，对中国书院与中国传统政教文明、士大夫精神传统、中国学术传统的关系有一个大致了解。

一、中国书院制度与中国传统政教文明

中华文明虽然与世界上其他文明一样具有政教相通的特点，但是中华文明政教形态的“教”不是宗教而是教育。在中华文明体系中，从事文化传承、人格培养的“师”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开启中国轴心文明时代的孔子就是以“师”来承担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和厚植文化情怀的，他最高的精神冠冕就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开拓的思想体系，对早期儒家的政教理念产生了深刻影响。早期儒家的政教思想有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对“德”“礼”“政”“刑”的文化价值与效能有一套从高到低的序列评价。孔子认为，“德”高于“礼”，“礼”高于“政”，“政”高于“刑”。“德”“礼”“政”“刑”是一种价值递减、效能逐渐降低的序列。在中国传统政教体系中，德、礼属于“教”，而政、刑属于“政”。孔子通过对国家治理的价值合理性与政治有效性的比较，肯定“教”是高于“政”的，即“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德”“礼”具有更大的

价值合理性与效能优先性。

西汉以来建构的国家系统和文明体系要求政教合一，体现出儒家思想的初衷。汉朝完成的政教形态是“秦政”与“周孔之教”的结合，从文明体系的价值关系上看，汉朝之政最终归依于周孔之教；但是从实际的权力关系上看，又可以理解为周孔之教依附于帝国政治。汉武帝将周孔之“教”纳入帝王之“政”的政教体系是帝国治术选择的结果。士人德教礼治的六经之学，通过依附于帝王强大的政治权力而得以生存和发展。历史上所谓“阳儒阴法”“儒表法里”是对这一政教形态的精神实质的进一步表述。汉宣帝对汉代政教形态的实质，有非常鲜明和确切的表述，即所谓“霸王道杂之”。在两汉建构的政教系统中，帝王们讲的德治、仁政主要是一种依附于帝国权力的“儒术”。

唐宋历史变革为秦制主导的政教形态转型提供了可能，在当时的特殊政治条件下，宋代士大夫不仅希望能强化其文化主体地位，还希望能在国家里有更大的权力而获得政治主体地位。唐宋之际发生的历史变革其实体现出政教形态转型的历史趋势，这一转型主要寄希望于将汉代帝王主宰建构的政教形态转化为宋代士大夫主导建构的政教形态。与此相关的是，他们希望将汉儒参与其中的汉学体系转化为由宋儒重建的宋学体系。宋代士大夫既是那个时代主导创通经义的文化主体，又是同时代主导革新政令的政治主体，故而实际上就是推动两宋时期政教形态转型的核心力量。

唐宋之际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等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思想敏锐的儒家士大夫意识到，再延续汉唐儒家对经典文本注疏的“师法”“家法”，已经不能够解决唐宋以来现实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儒学必须从汉唐经学注疏之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唐中叶以来，特别是两宋时期，儒家士大夫特别强烈地表达出主导政教体系的愿望。程颐应邀担任哲宗的经筵讲官时，曾对当时应该建构的政教形态

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看法：“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① 这恰恰体现出一种不同于汉代的宋代士大夫主导建构的新型政教理想的追求。而且，宋儒主张“以师道自居”，不仅拓展了对帝王的教育，而且推动了民间书院教育的大发展。前者是只有少数士大夫才可能拥有的机会，而后者却是每一个士大夫都有可能做到的事情，所以书院的文教成就更加显著，其产生的历史影响更为深远。宋代书院成型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成为宋代的一大文化景观。后来发生的一切，显然与宋儒“以师道自居”而推动民间书院教育直接相关。

所以，宋代书院从兴起到大盛，代表了宋儒复兴师道而重建政教文明的理想追求。宋儒总是将文化推广、社会教化看作是自己最重要的责任，他们创建了代表士大夫重建政教形态信念的民间书院，事实上这成为他们为后世留下的重要文教成果。所以，宋代书院在兴起之时就与宋代师道复兴运动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宋儒希望重新弘扬先秦孔孟等早期儒家士人的师道精神，以努力推动宋代书院的建设，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推动新的政教形态的形成。

宋代书院其实是宋代士大夫推行其政教理想的制度性体现，宋元之际史家马端临明确提出：“盖州县之学，有司奉诏旨所建也，故或作或辍，不免具文。乡党之学，贤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也，故前规后随，皆务兴起。后来所至，书院尤多。”^② 无论是中央官学，还是地方州县之学，它们均是由朝廷诏旨主导的官学体系，是由朝廷全面掌控的教育体系。而书院是“贤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这是读书人能够自己创办、自己主导的教育体系。士大夫可以按照自己新的政教理想，在孔孟师道之“教”的主导下重塑中华文明的政教理想，将书院建构成实现自己理想的文教典范。重视师道的“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就曾鲜明地表达过自己的政教理念，他在《洪范口义》

^①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论经筵第三札子》，《河南程氏文集》卷6，《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540页。

^② 马端临：《学校考七》，《文献通考》卷46，中华书局，2011年，第1340页。

中所探讨的国家治理大法，就包含他的师道理念及重建政教的理想。胡瑗在他关于国家治理的经典诠释中，特别强调师道高于政治权力，努力提高“师”在儒家理想政教形态中的地位。胡瑗说：“自古圣帝明王，未有不由师而后兴也。故传曰‘国将兴，尊师而重道’。又曰‘三王四代，惟其师’。故师者，天下之根本也。”^①胡瑗将“师”提高到天下之根本的地位，其实也是强调“师”应该居于政教形态中的主体地位。如果从这个视角考察宋代书院兴起，就能对中国书院制度与中国传统政教文明的关系有深一层的理解。

中国书院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化教育组织，其实是中国古典教育成果的集大成者。这种新型文化教育组织，不仅继承、发扬了早期儒家以“师道”为使命的政教文明特色，甚至可以说，它在宋代的定型恰恰完成了“师道”的制度性探索。两宋时期兴起的书院制度，其实是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悠久的教育传统，包括先秦诸子私学争鸣、汉儒精舍研经、魏晋名士山林清谈、隋唐高僧寺院禅修等等。作为一种教育组织机构，特别是作为士人和士大夫自由讲学、研究经典、学术辩论、修身养性的一种独特文化教育组织，宋代书院得益于千百年来贤士大夫们对教育形式的不断探索、不断积累。历史上有过的那些成功的教育制度和讲学形式，在宋代书院这里似乎均可以找到。先秦以来，中国学术史、教育史经历过几次重大的历史变革，即所谓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的学术史变革，不仅仅是学术思想、教学内容的演变，也包括教育制度、教学形式的演变，而后者恰恰是书院制度兴起的渊源。没有前面一千多年的教育实践的积累，就不太可能有宋代书院的形成。宋代书院成功地将以前教育实践的成果，都吸收、集中到这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中来，从而形成了代表儒家士大夫理想的书院制度。书院之所以能够成为重要的、延续千年的教育和学术研究机构，是因为集历史之大成。

^① 胡瑗：《洪范口义》卷上，纪昀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65页。

由于早期书院不是依靠朝廷的正式诏令而建立的，因此其制度建设的重要特点就是以士大夫本位的政教理想作为范型。所以，书院的主持者、管理者并没有纳入朝廷的官学教职，书院对聘任山长、选择学生有着独立自主权。书院聘任山长的主要依据是道德修养境界和学术水平，即选聘“经明行修，堪为多士模范者”的师儒充任山长。这些名师大儒在学术界、教育界的声望很高，他们可以确定书院基本规制，即确立教学、藏书、祭祀的整体制度安排与实际内容。如在人才培养与教学制度方面，主持书院的山长可以确立本书院的教育宗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制定相关的学规、教条。在祭祀方面，山长也可以确立本书院的祭祀对象，既不受外在政治力量的主宰，也不受强势学派的干扰。在藏书和刻书方面，书院山长更有自主权，可以选择自己喜爱、偏好的文献典籍。总之，主导书院教育的士大夫能够进一步强化宋儒秉持的“师者，天下之根本也”的政教理想追求。这种书院制度也促进了书院生徒的自由流动，他们可以择师而从、来去自由。所以，清人黄以周云：“沿及南宋，讲学之风聿盛，奉一人以为师，聚徒数百，其师既没，诸弟子群居不散，讨论绪余，习闻白鹿、石鼓诸名，不复加察，遂尊其学馆曰书院。”^①正是由于书院管理的相对独立性，许多儒家士大夫获得了文教的相对自治权，他们希望推动由“教”主导“政”的理想文明形态建设。可见，宋儒复兴师道精神，其实是为了强化师儒在政教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范仲淹在天圣五年（1027）的《上执政书》中说：“今天下久平，修理政教，制作礼乐，以防微杜渐者，道也。”^②这一个“道”体现在“政”上就是“王道”，而体现在“教”上就是“师道”，它们具有相通的政教精神与文明内涵。所以，范仲淹、胡瑗、孙复、石介

^① 黄以周：《史学略四·论书院》，《傲季杂著七种》卷6，清光绪二十年（1894）江苏南菁讲舍刻本，第18页。

^② 范仲淹：《上执政书》，《范文正公集》卷9，《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84页。

等宋初诸儒在推动宋代书院制度定型的同时，代表了宋儒对政教文明的理想追求。

尽管元代、清代的许多书院出现官学化倾向，它们或是被纳入官学体系，由朝廷直接委派山长；或是由朝廷、地方官府强化对书院的行政管理，对书院师生实行督查、奖惩等措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朝廷的“政”主导了书院的“教”，士大夫在政教形态中的主体地位下降。但是，就书院的文明意义而言，政教相维的基本形态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特别是由于书院的特殊形态与历史传统，元明清时期的士大夫群体往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宋儒创办书院的初衷，继续通过书院发挥自己作为文教主体的重要作用。总之，只有将书院制度纳入宋儒政教相维的文明体系，书院制度的历史意义与文教价值才能够得到更深一层的理解。

二、书院精神与士大夫精神

早期儒家提出的“师道”理念，一方面传承了上古三代奠定的政教一体的文明理念，体现出将教育纳入国家治理的思想传统；另一方面又体现出轴心文明时期的“哲学突破”，他们坚持以“师道”的独立人格和超越精神，表现出教育在价值追求、知识传授和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早期儒家关于师道的思想理念，深刻影响了宋儒士大夫的精神传统，进而影响到他们建构发展起来的书院精神。如果说宋代士大夫“留意斯文”而推动他们自觉创造了独特的书院制度的话，那么宋代士大夫以师道为终极关怀的精神传统培育了独特的书院精神。在中国书院的千年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中，那些受到后人褒扬的学术创新、教育变革的书院精神，其实就是书院组织的灵魂人物——士大夫的精神表达。而所谓书院精神，恰恰是浓缩了宋代士大夫终极价值的师道精神。

从中唐到宋初，士大夫群体表达出一个十分强烈的诉求，即在批

判汉唐士大夫沉溺辞章之学的陋习时，呼吁复兴早期儒家士人的师道精神。“儒”本来就源于以教育为使命的“师儒”，早期儒家号召士人应该“志于道”，其实就是强调士应该将自己的社会责任与文化使命相结合，最终凝聚为一种“师道”精神。宋代士大夫推动的复兴儒学与重建儒学，也是从复兴早期儒家的师道开始的。推动宋学兴起的“宋初三先生”又是“师道”复兴的推动人，欧阳修在《胡先生墓表》一文中说：“师道废久矣，自明道、景祐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胡瑗）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① 欧阳修肯定了胡瑗、孙明复、石守道对推动师道复兴的重要贡献，他们三人面对“师道废久”的文教衰落状况，通过创办书院、发展地方教育而推动“学者有师”的文化复兴，他们对宋学学统的兴起有开拓之功。关于宋儒的师道复兴与书院教育的密切联系，明清之际王船山曾经有评论，他说：“咸平四年，诏赐《九经》于聚徒讲诵之所，与州县学校等，此书院之始也。嗣是而孙明复、胡安定起，师道立，学者兴，以成乎周、程、张、朱之盛。”^② 他认为宋学由初起走向大盛，与师道主导下的书院教育密不可分。北宋初年，书院兴起，特别是孙明复、胡安定等宋初诸儒的推动，使得师道立而学者兴，推动了宋学之兴，最终形成了宋学的“周、程、张、朱之盛”。

如前所述，宋儒所念念不忘、魂牵梦绕的“道”，体现在“政”上就是“王道”，而体现在“教”上就是“师道”，而他们希望实现的“天下有道”文明理想，最终也主要依靠师者，即所谓“故师者，天下之根本也”。宋代士大夫之所以热衷于书院事业，是因为他们将书院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师道之所。所以他们确立的书院精神，主要是士大夫作为“师者”的意志表达与追求，体现出士人作为学术创新、教育变革主体的文化精神。士大夫对书院普遍有很深的为师者的文化情怀，能够表达出他们独立从事思想创造和文化教化的积极性。

^① 欧阳修：《胡先生墓表》，《欧阳文忠公集》卷25，《四部丛刊》影元刊本。

^② 王夫之：《真宗一》，《宋论》卷3，中华书局，1964年，第53页。

他们通过书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士人自由讲学与学术创新的精神，后来的学者将此传统称为书院精神。

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独特阶层，他们往往身兼学者与官僚两重身份，所以英文将其翻译为 scholar-bureaucrat。本来，学者的职责是传播与创新文化知识，官僚的职责是管理行政事务，士大夫则总是希望自己能够承担文化传承、行政管理的双重职责，并希望将学术教育与经世治国结合起来，这是王道与师道其实是同一价值实体的重要原因。由于士大夫的双重身份，故而会形成双重精神追求，并集中体现为书院的师道双重性。士大夫总是声明创办书院是为了“传道”“求道”，其“道”实质上包含着双重意义：既是士人从事民间教育以“道”作为个体存在的修身养性之本，又是士人将来以“道”而经世致用、兼善天下之本。具体而言，书院的“师道”精神往往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书院推崇以“道”修身的为己之学，希望以“道”来完善自我人格，即所谓“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其二，希望将来有显达机会时能够以“道”治世，通过行道来完善天下秩序，最终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目标。

所以，士大夫对师道的追求，使书院能够成为中国古代最有创新精神、人文追求的文化教育组织，表现出一种对学术创新、人文化成的精神追求。唐宋以后，士大夫们胸怀重振儒学的文化使命，抵制佛、道两家的思想，倡导复兴儒学、创立理学，这一文化思潮的发展需要借助私学教育机构，而初步形成的书院正适应了这种文化思想发展的需要。唐末五代开始萌芽的书院，到了两宋时期勃然兴起。从原始儒学中提炼发展出来的师道精神，借助于书院而得到充分展现。宋儒之所以热衷于在官学之外另建书院，是因为他们坚信只有书院才是师道精神的完整体现，才能够弥补官学教育的严重缺陷。如朱熹明确声称另建书院是为了讲学传道，而不是为了科举考试，他说：

“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① 基于上述原因，书院能够发展成为宋以后的一种重要文化教育机构，在中国教育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由于士大夫不仅仅是学者身份，也可能是行政官员，或者是政府官员的预备人员，他们天然具有现实的经世治国与政治功利的思想倾向。张栻撰写的《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就期望来岳麓书院读书的学子们“成就人才，传道以济斯民也”，将成就经世济民之材作为岳麓书院的教育宗旨，殷切盼望他们“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② 可见宋代士大夫在自己建构的书院精神传统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经世致用追求。士大夫的经世致用追求，无不表现在书院的教育宗旨和各项院规、院训之中。所以，宋代书院不仅仅会形成学派，同时还会形成政治上的党派。宋代学术界、教育界的学争和党争的结合，也深刻影响到书院。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元明清。明代东林书院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主持东林书院的顾宪成、高攀龙要求学生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他们在书院悬有一副著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所以，顾、高不仅以东林书院为基地形成了东林学派，而且还形成了一个被称为东林党的政治集团。

三、传统书院与传统学术的互动

书院既是中国古代的教育中心，也是学术思想的研究中心。因此，书院的盛衰与宋以后学术思想的盛衰是同步的。学术思想的繁荣发达，总是要寻求、获得相应的教育组织来传播，从而促进书院的发达；而书院教育的发达，亦可以进一步促进学术思想的繁荣。因此，

^① 朱熹：《朱子语类》，《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81页。

^② 张栻著，杨世文点校：《张栻集》，中华书局，2015年，第901页。

学术思想的繁荣发达成为书院创建、发展的重要条件。宋以后，书院成为重要的学术研究机构，宋、元、明、清历朝的学术研究和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书院成为宋以后各种新兴学术思潮的萌发基地。

北宋庆历前后的数十年间，正是书院初兴、成型的重要时期。以范仲淹、孙复、石介、胡瑗等为代表的庆历士大夫群体，在推动宋学兴起的同时，亦推动了书院的兴起。范仲淹对书院教育的推动，主要表现在他与睢阳书院的学缘关系上及在睢阳书院的教学活动中。范仲淹的睢阳书院讲学具有引领作用，影响了“宋初三先生”对宋学的开创。孙复在睢阳书院的求学与教学经历，影响了他居泰山讲学读书并创建著名的泰山书院。孙复在泰山书院著述、讲学的《易》《春秋》，恰恰体现宋学所要解决的圣人之体与圣人之用的根本问题。石介在《泰山书院记》中，将道统传承与书院使命结合起来。另外石介还创办、主持了徂徕书院。到了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相继涌现，名师鸿儒辈出，许多在中国思想史上十分重要的理学学派都已形成，各学派之间、理学家之间展开了讨论、辩难等学术活动，这一切，都与书院有着密切的联系。南宋理学史上几个重要学派的代表人物均与书院密不可分，如张栻之于岳麓书院、朱熹之于考亭书院与白鹿洞书院、陆九渊之于象山书院、吕祖谦之于丽泽书院等。不同理学学派在书院研读经史、阐谈义理、会讲论辩、著书出书，书院成为他们从事学术研究、传播思想、创建学派的最理想场所。南宋理学学派均是以书院为学术、教育基地而形成的。

明初统治者也很推崇程朱理学，重视文化教育，但他们并不喜欢书院，而是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发展、完善各级官学上。一旦官学成为科举的附庸而“士风日陋”，一批倡导学术文化创新的士大夫便创办、复兴书院，利用书院培养人才。明正德年间（1506—1521），王阳明、湛若水提出一套以“心”为本的学术宗旨，以图达到“明学术、变士风，以成天下治”的目的。心学兴起之后，士大夫精神开始崛起，形成了一股影响巨大的文化思潮。明代儒家士大夫主要借助

于书院，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与文化情怀。明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被贬到贵州龙场，在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龙场悟道”之后，开始创办龙冈书院，主持贵阳书院，传播自己“知行合一”的立言宗旨。之后，他又在江西修复濂溪书院，在浙江会稽建立会稽书院，江南士子纷纷从学。王阳明及其弟子门人创办书院进行讲学，极大地推动了学术变革、教育变革。有人称：“自武宗朝王新建^①以良知之学行江浙两广间。而罗念庵、唐荆川诸公继之。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顿盛。”^② 另一重要人物湛若水也对明代书院兴盛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湛若水是著名学者陈白沙的学生，湛学也主张以心为本，但又自标宗旨是“随处体认天理”。他在40岁以后的50多年内，无日不在书院授徒讲学。《明儒学案》称他“平生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从游者殆遍天下”^③。王、湛及其弟子的历史功绩不仅仅在于建立了一大批书院，更重要的是恢复了书院自由讲学的精神，使书院成为重要的学术基地。同样，蓬勃兴起的书院亦推动了心学思潮的发展，阳明心学能够在全国各地广泛传播，王门弟子能够遍布江西、福建、浙江、湖南、广东、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亦主要是借助书院讲学。

明清之际，为纠正王学空谈心性、误国误民之弊，学术界兴起了一股崇实的学术思潮，学者们以崇实黜虚为宗旨，强调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实学思潮中的著名思想家仍是以书院为学术研究的基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东林学派的东林书院、颜李学派的漳南书院。明万历年间，顾宪成、高攀龙于无锡建东林书院，标榜务实的学风，在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颜元是清初的一名学术大师，他提倡实学，重视“习行”，反对空论心性，他在家乡河北博野创建了漳南书院，分“文事”“武备”“经史”“艺能”，将各种经世致用之学的内容纳入

① 王守仁被封为新建伯，故称王新建。

② 沈德符：《畿辅》，《万历野获编》卷24，中华书局，1959年，第608页。

③ 黄宗羲：《甘泉学案》，《明儒学案》卷37，中华书局，2008年，第875页。

教学。明清之际，还有许多倡导实学的思想家利用书院讲学，在书院从事学术研究。

清代乾嘉时期，注重经史考据的汉学思潮大兴。这一学术思潮在整理、研究经史文献方面有重要的贡献。他们还由治经发展出一系列专门学科，诸如小学、史学、天算、地理、音韵、金石、校勘等。汉学思潮兴起时，也以书院为学术研究的基地。著名汉学家段玉裁主讲山西寿阳书院；号称“博极群书”“无经不通”的钱大昕主讲钟山、娄东、紫阳书院共合计近三十年；兼治汉宋之学的姚鼐也曾主讲梅花、紫阳、敬敷、钟山书院共四十年。汉学家创办的书院中最著名的是阮元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诂经精舍在浙江杭州西湖孤山上，清嘉庆五年（1800）创建，这个名称就体现着创办者的学术宗旨。精舍本是东汉经学家诂经之所。诂经精舍由阮元、王昶、孙星衍、陈寿祺等主讲，传习、研究经史、辞赋以及天文、地理、算法、兵刑等学问，并组织学生校勘《十三经注疏》等，在汉学研究上取得了重要成果。道光元年（1821），阮元又于广州城北粤秀山下创学海堂，专以诂经考试学生，并重视汉学研究，搜辑清代经师注疏，刊《学海堂经解》180余种，达1400卷。嘉庆以来，诂经精舍、学海堂成为国内汉学研究的重要学术基地，既培养了大量汉学研究的人才，又涌现出大量汉学学术研究成果。

宋以后，中国学术史上先后涌现出理学思潮、心学思潮、实学思潮、汉学思潮，这些思潮均和书院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各种思潮、各派学术大师均以书院为基地从事学术研究，使书院成为各种学术思潮、学术派别的大本营，从而推动着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与创新。

1901年，清廷推行“新政”，延续一千多年的书院制度突然之间被废弃。当时的文化界、教育界将此责任归结为腐败的书院不再能够承担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使命。其实，书院改制的根本原因，在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世界近代化大潮的历史背景。晚清以来，中

华文明面临“凤凰涅槃”式的自我改良或自我革命。在疾风骤雨式的书院改制之后，开始全面引进新的文化教育制度。但是，就在新教育体系建立起来之后不久，一个重要问题很快引起人们的关注。一千多年的教育制度为何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匆忙地被废弃呢？这一个问题，很快激起知识界、教育界的普遍反思。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几个主流思潮，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等，它们对未来中国的政治愿景有完全不同的设想。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些不同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都对书院制度的废弃表达出不满。自由主义思想家胡适认为，书院制度之废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青年毛泽东在长沙办湖南自修大学，明确表示要继承书院传统；另外，许多文化保守主义者如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钱穆等，则主张恢复传统书院，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显然，产生这一现象是因为中国传统书院有非常深厚和独特的文化价值，这些政治观念、思想观念不同的知识界、思想界和政界人士，对书院制度被废弃的历史事件形成了共识。更加值得关注的是，21世纪中国形成发展出中华文化复兴的巨大文化思潮。在中华文化复兴的浪潮下，中国书院复兴也显示出巨大的影响力。当我们今天在思考和呼唤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复兴的时候，书院应该成为传统文化复兴的基地。21世纪以来，书院精神和书院制度已经为各界人士所推崇，已经成为今天中华文化复兴“最大公约数”。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传统书院不仅承担中华文化复兴的历史使命，而且它本身就是中华文化复兴的体现。^①

四、关于本书的写作与出版

中国书院文化有上千年的衍化历史，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文化教

^① 朱汉民：《文化复兴与书院中国》，《新华文摘》，2019年第14期。